

朱陈哈尔滨

九二一

目 录

杂 话 哈 尔 滨

一九六二年七月至十二月

哈尔滨的诞生	彦 茹 (1)
哈尔滨名称的由来	彦 茹 (2)
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 (上)	孜 然 (3)
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 (下)	孜 然 (4)
哈尔滨的喇嘛台	孜 然 (5)
賭博場——賽馬場	彦 茹 (6)
修建江桥的一笔血泪仇	沈语凡 (7)
义和团对哈尔滨的围攻	沈语凡 (8)
外来语杂拾 (之一)	江 南 (9)
外来语杂拾 (之二)	江 南 (10)
外来语杂拾 (之三)	江 南 (11)
兆麟公园语今昔	左学仁 (12)
噩耗陡至 灵牌独设 官場丧考妣	
喜讯纷传 旗帜双掛 民间送瘟神	江 南 (13)
景阳街, 许公路与许景澄	张福山 (14)
粪污落到了自己头上	
——蒋记“国大”的一段丑闻	江 南 (15)
郊区农业的垦殖	沙 风 (16)
三十六棚早年的一场斗争	刘洪涛 (17)
也谈姚锡九	王永敏 (18)
从傅家甸到埠头区	沈语凡 (19)
吁驾一声 铁轮滚滚	彦 茹 江 南 (20)
杂话中的杂话	彦 茹 (21)
1932年的大水	马月乔 (23)
我市所属八个县的名称和建制探源	王之堃 (24)
哈尔滨车辆厂建厂铃爪	张福山 (25)
黄山咀子考古琐谈	丹化沙 (25)
杂话中之杂话 (之二)	彦 茹 (26)

哈尔滨历史上的工人罢工运动·····	张福山 (27)
杂话中的杂话 (之三) ·····	彦 茹 (28)
华乐午台上的《爱国娇》·····	公 羊 (29)
杂话中之杂话 (之四) ·····	彦 茹 (31)
顾乡电话旧·····	王青海 (31)
碧莲花学戏成名·····	公 羊 (33)
婚礼	
——顾乡电话旧之二·····	王青海 (34)
“朝鲜大坝”的建设者们·····	王青海 (35)
顾乡电话旧之三	
抗战史上哈尔滨的一页·····	马月乔 彦 茹 (36)
国民党反动派在哈尔滨的罪行一斑 (之一) ·····	马 方 (37)
国民党反动派在哈尔滨的罪行一斑 (之二) ·····	马 方 (39)
哈尔滨历史上的学生运动 (上) ·····	孜 然 (41)
哈尔滨历史上的学生运动 (下) ·····	孜 然 (42)
恶霸地主姜大麻子罪行录·····	沈语凡 马 方 (43)
一号门的故事·····	张福山 (45)

一九六三年一月至十二月

“天马剧团”与“大北画刊”·····	彦 茹 (46)
无恶不作的反动“黑狗”·····	春 雨 (48)
——国民党反动派在哈罪行录	
无孔不入的外商企业·····	亚 明 (49)
春节——旧社会的“年关”·····	春 雨 马 方 沈语凡 (51)
打倒黄色工会·····	李亚东 张福山 (52)
“二七”的消息传来·····	阿 未 龙之游 (53)
李九鹏和他的“俱乐部”·····	志 文 张 铁 (54)
香坊的几个名称·····	崔喜祿 (55)
太平桥——当年的贫民窟·····	王 捷 (56)
顾乡屯的菜农·····	王青海 (57)
——顾乡电话旧之四	
太平桥的“四霸天”·····	王 捷 (58)
朋比为奸 巧取豪夺·····	沙 风 (59)
——哈尔滨地区大地主的形成	
“哈巴狗”的下场·····	刘 辛 (60)
——毛织厂工人斗争史的片断	
老巴夺的第一个剥削对象·····	斐 果 (60)

“矫正院”——闫王殿·····	王 捷 (61)
人人痛恨的“溜白菜叶”·····	慕 雷 (62)
我市早年的“五一”革命活动·····	彦 茹 (63)
“五四”前后革命活动点滴·····	彦 茹 (64)
卖“老博代”的人们·····	何达理 (65)
再谈“会局”·····	王 捷 (66)
当年的搬运工·····	王士凡 (67)
旧社会电车工人生活的剪影·····	恭长拾 (68)
洒遍烈士鲜血的圈儿河·····	王 捷 (69)
旧社会店员的苦难·····	马月乔 王贵桓 (70)
铁路煤炭装卸工人的悲惨生活·····	王 树口述 (71)
压在三十六棚工人头上的恶魔·····	崔喜祿 (72)
伪满时期的活地獄太平桥“新地号”的由来·····	王 捷 (74)
把头罪行的种种·····	春 雨 (75)
清扫工人过去的遭遇·····	宋世生 刘 瑛 陈继尧 (77)
再谈“矫正院”的内幕·····	王 捷 (78)

杂话哈尔滨

編者的話：

哈尔滨从建城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许多读者对它的历史很感兴趣。根据读者的要求，我们开辟了这栏目，来反映哈尔滨历史上的一鳞半爪。

既然是“杂话”，自然也就难于求全。年代最远，资料缺乏，所谈的或是个人经历，或是来自传闻掌故，文章难免有不完整、不准确之处。我们希望读者质疑研讨，及时匡正。

哈尔滨的诞生

彦 茹

哈尔滨建城已经六十四年了。六十四年间，她从无到有，如今是这样的美丽。所以每当想起哈尔滨的建城历史，我都不禁衷心地赞美我们城市人民的劳动和智慧。

六十四年前的哈尔滨，只是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几十户零落的人家，一片荒野。香坊的烧锅，要算这里唯一的大工业了。以烧锅为中心的最“繁华”的居民点，也不过二十二户人家。后来根据“中俄密约”开始修筑东清铁路（后名中东路、中长路），而东清铁路当局又把哈尔滨选做了筑路和经营的中心。1898年6月9日（俄历5月28日）东清铁路建设局副总工程师俄人依格纳齐乌斯率领建设人员到达此地，开始了最初的建设工程。后来，人们就把这天当成了哈尔滨诞生的日子。因此，哈尔滨建设的起因是由于东清铁路的修筑，是在俄国人的主持下开始的。她最初的建设经费是帝俄由清政府所得之“庚子赔款”中的七千万卢布，是中国人民的血汗。参加建设的劳动者是从俄国调来的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我国劳动人民。所以我们的城市可以说凝结着中俄两国工人的劳动和智慧。

哈尔滨的城市建设，是从香坊开始的。东清铁路的建设队到达之后，先是用八千两银子买了香坊的烧锅，作为建设本部，建起了临时铁路建设管理局、会计局、铁路技术部、道胜银行分行、铁路俱乐部和教堂等，因之香坊向有“老哈尔滨”之称。秦家岗亦即现在的南岗，从1899年开始修建，俄国人称之为“新城”。据说南岗的喇嘛台就是这年10月1日动工的。1900年夏天，义和团围攻哈尔滨，曾使南岗的建设工程一度中断，直到1901年，这一带的建设才初具规模。当时南岗下坡以至现在的火车站，原是一片丛林，如今仅存的当年遗迹，只有哈尔滨站月台上挺立着的两棵老榆树了。那时的道里还是沼泽地带，因为从松花江水运来的筑路器材需要从这里卸下，所以俄国人才在这里修筑了码头和从码头通往香坊的道路，在江边建起了临时的材料场、制材场和工人宿舍，并在1903年以后建起了楼房和街道，形成道里商业区。这就是道里长期为俄国人称

作“码头”的原故。道外，在六十多年前，是哈尔滨这一带江畔渔火中相当引人的地方。据说有一位名叫傅海山的山东老乡，在1900年由山东经过北京、内蒙草原来到了这里，开设了一家鸡毛小店，即所谓傅家店。这家小店竟成了当年沿江渔民和拓荒者们的唯一“乐园”。那时人们在这里歇脚住宿，酒话桑麻，兴之所至，还可以玩上两场“博奕之戏”。道外的“傅家甸”的名称，就是由“傅家店”而来的。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道外才由我国人民自己建设起来，先是沿江地方，接着向里发展，逐步建成市街，到1916年，道外的市街扩展到了四家子，1919年更扩展到了四家子以东太平桥一带，遂形成了市内的另一个繁华的商业区。至于南岗东部的马家沟和道里西部的“偏脸子”，则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大批白俄流亡到了这里，才以他们为主，慢慢修建起来的。在那以前，“偏脸子”曾是有名的“野鸡窝”，直到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还常常到这里来猎取肥美的野鸭子呢！

这就是哈尔滨当年的情景和建城初期的一些事情。六十四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一个瞬间而已。然而，就是在这短短的年月里，哈尔滨却象神话般的成长起来。沧海桑田固然是事物发展中所见的，但如此神奇的变化，确是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的。

原载《哈尔滨晚报》1962年7月3日第三版

哈尔滨名称的由来

彦 茹

我们朝夕于斯的哈尔滨市，四年以前满了花甲。但是，它和许多历史悠久的古城相比，却又是十分年轻的了。它在诞生后的两年，即1900年，开始“入册”，出现于地图之上，随着中东路的发展，一跃成为通都大邑。“哈尔滨”这个名字八方播扬。不过，要是追问：为什么这个城市偏偏叫“哈尔滨”？这倒是一个“名”出有因、查无实据的难题了！

就我所知，“哈尔滨”这个名称的由来，通常有这样几种说法：第一种认为出于满语，原音“哈勒费延”。它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打鱼网或晒鱼网场，一是摆渡场。第二种说是出自蒙古语，音为“哈喇滨”，意为平地。又说，“哈尔”在蒙语中，是“黑暗”。意思是哈尔滨一带原为杂草丛林所蔓蔽，灰濛濛、阴郁郁，即使白昼，江边一带也暗淡无光。第三种说法，为汉语“好滨”的音转，指这里江天景色宜人，又饶地利，适于移居，因此被人赞叹为“好”的江“滨”，第四种是俄语的译音，有一个古怪的意思：大坟墓。此外，还有认为哈尔滨是松花江畔一个大地主名字的借称，等等，等等。

这些说法，我们只要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其中有些大有破绽。拿汉语“好滨”来说，滨作涯岸解，是古人的习惯用法。《诗·小雅》中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今人虽也相袭沿用，但和通常用语毕竟有些距离。1898年开埠当初，这一带汉人很少；即便有一些，也只是从事渔耕和以后修筑道路的“苦力”。当时取地名，是不会取“好滨”这样沾带文气的名字的。至于俄语大坟墓，持此说者认为帝俄时代俄人想永远占据此地，死后坟墓也留在这里。这种“存亡与共”的说法，也十分牵强；而况俄语

中无并此语呢。俄语坟墓一词读为“克拉兹比斜”，与“哈尔滨”毫无近似之处。再就感情习惯上讲，以坟墓这样不祥的名称，作为野心营殖的地方的命名，也是殊乖事理的。等而下之，认为“哈尔滨”是大地主的名字，更属无稽之谈。那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凉，何来地主？又遑言及“大”？即使退一步说，这是一位拥有大片土地的“占山户”，但也总会留下一些可资探寻的遗踪轶闻的。道外傅家店的傅家和江北马船口的马家，至今还留存在老辈人的记忆之中，何独这位“哈”某，本人既属虚无飘渺，后代又靡有子遗？这不是子虚之谈，又是什么？

现在再看看剩下的第一个、第二两种说法。以蒙语命名，这还不无道理。我省有些地方确是以蒙语命名的。但与满语晒网场、渡场的说法比较，我宁愿信服后者。满语的说法更贴切合理一些。历来也多采纳此说。满族命地名的习惯，常好以地方的特征为依据。譬如阿什河，河流弯曲如耳朵，因此满人就以满语耳朵“阿勒楚喀”来称呼。当时我们这里是个小渔村，居民打渔晒网或许偶兼摆渡。在它的南边有双城北部的旗屯（即所谓“三大屯”），在它的西、北边有呼兰的官庄。这些地方满族旗人都很多，踪迹往还，循实而命名，沿习相称道，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哈尔滨车站早年还叫“松阿里”站，以松花江的满族语音为据，这不是也可作为参证吗？

昔年荒寂的渔村，早已屋栋难寻了。今天的哈尔滨市街櫛比，工厂林立。“动力之乡”，闻名全国；“江天一览”，引人流连。我们以取义为“晒渔网场”的旧名，来称呼今天繁荣美丽的哈尔滨，有人或许以为这很能说明六十年沧桑变幻的罢？其实，从一个僻陋的渔村发展为新型的工业基地，这不是别的，这正是千百万劳动者辛勤劳动的结晶。

原载《哈尔滨晚报》1962年7月4日第三版

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

孜 然

1933年4月，哈尔滨二百多名电车司机和售票工人，举行了著名的反日大罢工。直接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对于我省以及整个东北人民的抗日，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1933年中共中央出版的《斗争》上曾经连续在41、42、43三期，发表了哈市电车工人大罢工的文章，专门介绍了这次罢工斗争的情况和论述了斗争的意义；当时在哈尔滨出版的《滨江时报》也连续报道了这次罢工的经过；当时哈尔滨比较激进的“国际协报”为此还特地出刊了号外。

这次罢工斗争的经过是这样的：1933年4月2日“晚八时许，二号电车自县署（道外当时属滨江县）开往车站，至景阳街时，有一便衣乘客登车。车掌张洪渔令其买票，……对方则不买。时车已行至桃花巷站，该宪兵（按即不买票之便衣乘客）即将张扯下车，将张拳打……”（1933年4月4日《滨江时报》载：“昨日电车停驶经过”），以后并把张洪渔拉到宪兵队内，打得遍体鳞伤。这时哈尔滨电业局已有中国共产党支部地下组织。党支部在老曹和赵一曼同志等领导下，决定举行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借此反

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因此，张洪渔被打事件发生后，“群众激愤，开车者马上将车开回车站，各车一律停驶，几个最积极的团员和党员、工会会员，立刻号召群众到总厂开群众大会，到会百余人，群众情绪高涨，在大会上，经过悲愤激昂的鼓动，一律通过罢工”（《斗争》41、42期）。会后，所有电车没有一辆开出车库，全市交通处于瘫痪状态，“由南岗至道里道外之马路上，（行人）络绎不绝，均难形于颜”（4月4日《滨江时报》）。

4月2日，在罢工开始的夜间，电车工人们连夜“做出画报七张，标语口号二百余张，分贴在景阳街、桃花巷、车站、新城大街、总厂、沿电车路各马路”（《斗争》41、42期），还贴出了“告哈尔滨市民书”。在一张漫画上，画着一名工人被宪兵打得头破血流，旁边写：“不敢出车了，怕被宪兵打死”（《滨江时报》）。在“告哈尔滨市民书”里，说明了罢工的原因，呼吁群众给予支持。

4月3日，即罢工后第二天早晨，工人又召开了大会，“到会者比昨日更多，由五点多钟开到八点多钟，表现了全部电车工人的伟大团结与一致”（《斗争》）。会上，工人们向宪兵队和电业局提出了五项条件：

- 1、肇事祸首交工人处办；
- 2、被打伤工人给恤金五十元；
- 3、被打伤工人病期双薪；
- 4、医药费由宪兵负担；
- 5、保证以后不发生这样事情。

工人们表示，不答复这些条件决不复工。

（上）

原载《哈尔滨晚报》1962年7月9日第三版

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

孜 然

在4月3日早晨，伪电业局总办高义恆，“携同其他有关股员以上十余人急至总厂”，来瓦解工人罢工。先由电铁科长郭連壁，诱骗工人复工，被愤怒的工人哄下台去。接着电业局总办高义恆秉承其日本主子的意旨，亲自上台，用拉拢、诱骗、威胁的办法，向工人们说：“这次宪兵并不是打你们，是看不起电业局，这和打我一样。但是交通不能不维持，不然日本方面不让，你们大家要上当的。”之后，他又欺骗工人说：“这些（条件）容易，卹金马上可拿；人已送到医院，不过要祸首得宽我几天来交涉，其余（条件）没问题”（“满洲哈总关于电业工人反对宪兵殴打工人罢工报告”）。有一小部分工人被骗曾于4月3日上班，但刚刚出车，又发生了伪警察殴打工人的事件。电业局又急忙派人来欺骗工人说：“宪兵打人电业局都可代办，警察打人电业局更可代办了”。这时，党及时地揭破了电业局的欺骗谎言，教育工人又继续坚持了罢工。

4月4日，敌人的欺骗手段失败后，又改用武力威胁，派警备队和警察包围了罢工工人，枪上插着刺刀、牆头架着机枪。电业局总办“命令”工人立即复工，否则予以开

除。这时工人们毫不动摇，坚决表示，不答复条件决不复工，并高呼“反对开除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被迫只好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当时，党认为罢工已收到很大效果，现在电业局又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因此决定于4月5日复工。

工人复工之后，电业局不但没有实现诺言，反而开除了六名工人（全是大罢工中的积极分子）。电业局在5日贴出的布告里写道：“查争殴曲直，可由法律制裁，与群起罢工极不联属。该机掌等昧于此义，妨害本局业务，募此为甚。经查内部，实系少数鼓动，因之事件迭出。当即查明此事件‘害群人’霍令九、朱英、杨兆顺、张凤翔、刘仁智、鄢福昌等六人，即予开除，而儆效尤……”（1933年4月5日《滨江时报》）。电业局想用开除工人手段来镇压工人的反抗斗争。

杨兆顺等六人被开除后，全体工人更加仇恨敌人，自动地“每人捐洋三元，共六百元”（《滨江时报》）来救济被开除的工人弟兄。工人们用这笔钱，在电业局附近开设了一个“聚兴号粮米店”，在这个粮米店存在的半年中，它成了地下进行活动的据点。哈尔滨电车工人曾通过它，把一面红旗和许多慰问品以及几次的捐款，送给了党领导的第一支东北抗日游击队——磐石游击队。1934年初，日寇进行“大逮捕”后，哈尔滨部分优秀的电车工人由上级党组织派往哈东一带农村，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们后来都成为抗联的重要干部，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哈尔滨电车工人的抗日斗争，在我省人民抗日斗争史和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具体地证明了哈尔滨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具有反帝斗争的优良革命传统。

（下）

原载《哈尔滨晚报》1962年7月11日第三版

哈 尔 滨 的 喇 嘛 台

孜 然

在哈尔滨，无论你到南岗、香坊或道里，都可看到各种风格的喇嘛台。这种喇嘛台，大大小小全市有三十所左右。它使哈尔滨的市容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风味。

喇嘛台，是我市人民长期习惯的称呼，实际上这就是俄国人的教堂。原来帝俄时代的俄国人民多信奉希腊正教（希腊正教是希腊化的基督教的名称，以别于西欧的罗马正教——天主教），远在基辅公国佛拉基米尔公统治时期，从公元988年俄国就传入了基督教。所以已有一千年的历史，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1898年随中东铁路的修筑，俄国人首先在哈尔滨的香坊开始修建了教堂。以后在中东铁路沿线更不断修建，至1920年时中东铁路沿线已建十九所，至1937年仅北满沿线一带建有五十五所，其中哈尔滨一地即达二十一所。中东铁路总局专设有“寺院课”以管理沿线各地教堂，每年为此拨出大量经费。

在哈尔滨名气最大的要算南岗喇嘛台了。它是过去中东铁路各寺院的中心，因此过去也称为“中央寺院”，原名为“圣尼古拉教堂”，建于1900年。1899年10月1日举行奠基式，1900年春动工。中间因爆发义和团运动，7月间义和团围攻哈尔滨，工事暂停，至同

年12月始告竣工。它的建筑图样是在当时帝俄首都彼得堡（今列宁格勒）设计的，由俄人雷特維夫工程师主持建成的。其正门上部的圣母象和正殿东方外部的壁画，系俄国画家古尔希奇文克所画。在殿内尼古拉象下部嵌有奠基式纪念铜板，铜板上刻有俄文，意为：“尼古拉皇帝即位六年、清国皇帝光绪二十五年、世界创造7407年、基督降诞1899年10月1日，财政大臣微德、铁路总办克尔彼奇、铁路建设局长犹哥維奇。于松阿哩市，在铁路守备队属司祭祝福下，建设工程师雷特維夫建此”（哈尔滨当时称为松阿哩，因此铜板上刻为“松阿哩市”）。

在哈尔滨修建最早的则是香坊的教堂。1898年7月20日，在香坊首先建成一座简易的教堂，亦称“圣尼古拉教堂”，同时在这里举行了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的基督教祭式。同年冬天这所简易教堂移至卫队街，即现在的教堂所在地。1926年重建成现在的教堂。

在哈尔滨最大的教堂是道里石头道街（在透龙街对面）的“圣索菲亚教堂”。它有着莫斯科式的大圆顶，是一个能容两千人的大教堂。这个教堂于1923年动工至1933年才全部完工（一说为建于1922—1932年）。费时十年，据说工费五十万元。

南岗的“乌克兰教堂”也是比较有名的。这个教堂建于大直街的旧俄人墓地之一角，是“东罗马式”的建筑，是希腊教会堂的基本样式，其特色是平面大体为正方形，中央冠以圆球盖，在一方有龕状突出部分。这个教堂系俄国名建筑家基达诺夫设计，于1930年建成。它的正式名字为“圣母守护教堂”，当时这个教堂由在哈的乌克兰人信徒负责維修，故名“乌克兰教堂”。

此外，道里地段街1908年建的“耶尔斯基教堂”以及道里经纬街、炮队街的两所犹太人教堂和波兰教堂也都是别具风格，各有特色的。

原载《哈尔滨晚报》1962年7月13日第三版

賭博場——賽馬場

彦 茹

如果你有机会走过哈尔滨的“动力之乡”，看到三大动力厂的那一片宏伟的建筑，你绝料想不到这里原来就是最能代表解放前哈尔滨都市生活腐朽面的“賽馬場”。

“賽馬場”是什么？这是年轻的读者们不大熟悉的。倘若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旧社会的事物，仅仅顾名思义地以为賽馬場就是举行賽馬的地方，以为那里的賽馬是一种有趣的体育活动……，那就完全错了。那时候参加賽馬的人不是以体育运动为目的，看賽馬的人也不是为了对体育活动有兴趣。它是一种賭博，是旧社会罪恶的淵藪（zōu 音撒）。

哈尔滨賽馬場最初是由私人资本家经营的，建于马家沟的南端，当时名叫賽馬俱乐部。“九一八”事变后，于1934年改为“国立哈尔滨賽馬場”，場址移建于今王兆屯一带。每年4月末至10月间共有四十天举行賽馬。一般地在每星期六、星期日或假日举行；定期的则为每年四月二十七、八、九三天，五月四、五、十一、十二、廿五、廿六

等六天，六月一、二、八、九、廿二、廿三、廿九、三十等九天，七月六、七两天。赛马时间以夏季较多。

赛马的形式分三种：一种叫做驾车赛马，是以美洲产的高大“洋马”驾以特制的双辆车，一名御者坐车上；一种是以蒙古马的抽签赛马；再一种则是以东北产的马。骑手多是雇佣的，为了招徕观众，还常以打扮妖艳的女骑手出场。资本家们不仅以此为娱乐，更要紧的是以赛马作为投机、牟利的一种赌博。每次赛马总要卖出大量的所谓“马券”，一般的为五元一张。有钱的人有的买一两千元的“马券”，如果他选中的马号得到胜利，则可以得到加倍的赔偿，否则也就速本输光。马场主为了更多地剥削广大观众，还在每一场赛马前临时发售一种“摇彩票”，一元一张，按每场出场马的号数发售，每场赛马后，则按规定额数入选的马号顺序，给予中号者不同数目的奖金。中第一名的给予一千元，但每场售票数千、多至上万（观众有的一人买数十张）而入选的不过数名。因此在赛马场上，曾有多少人赌得倾家荡产，最后落得家败人亡，而场主却总是大发其财的。

旧社会把一切都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锻炼人勇敢矫健的赛马活动，竟然也被蒙上一层厚厚的铜臭。可怜那时的骑马运动员们竟成了替资本家牟取利润的工具，女骑手更要出以色相换取温饱。但这种情况在旧社会却是不足为奇的。

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洪流，冲掉了旧社会的一切污浊，哈尔滨的赛马场也被洗涤得干干净净了。哈尔滨人民在这罪恶的赛马场的废墟上建起了全国闻名的“动力之乡”，以它出产的现代化的动力设备支援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原载《哈尔滨晚报》1962年7月16日第三版

修建江桥的一笔血泪仇

沈 凡

滨洲线上的松花江大铁桥，是哈尔滨的门户。远远望去，在滚滚的江流之上，一具长桥，飞架南北，把松花江两岸连为一体。桥上每天隆隆通过一列列火车，桥下悠悠驶过各种船只，天光水色与雄伟的江桥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这座江桥为哈尔滨凭添了多少声色！

然而，当我们看到这座江桥，却常常想起一桩修建这座桥时的血泪斑斑的往事，那是哈尔滨劳动人民的血泪仇。

这座江桥的修筑是1900年，通称为老江桥。臭名昭著的汉奸恶霸姚锡九，是当年江桥工程的包工头之一，工人受尽了他的侮辱和剥削。在桥柱工程即将竣工的瞬间，这个灭绝人性的姚锡九，竟暗使他的爪牙，把水下“沉箱”的排水管尽行抽出，致使正在水下作业的几十名工人全部淹死，因此，姚锡九从每个死者的身上取得了六百元的抚恤金，一跃而成为富翁。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实在是令人发指的，然而当时的姚锡九却依然能够逍遥法外，并且一直压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剧作家曹禺的著名话剧《雷雨》中，曾提到资本家周朴园的借包修江桥淹死工人而血腥发家的事，据说就是以姚锡九的

这件谋财害命的事情作“模特儿”的。

姚锡九终于没有逃出人民的法网。哈尔滨解放之后，人民政府立即逮捕了这个作恶多端的汉奸恶霸。1946年7月11日，在省立二中的操场上，举行了全市人民公审姚锡九和另一个汉奸恶霸李九鹏的群众大会，参加公审大会的达十万人。是日，会场内外，满是赴会的群众，甚至连会场周围的房上、树上、高岗上，以及会场外边的马路上，都挤满了人群，把会场围了个水泄不通。为使群众都能看到公审，只好临时拆去台上的席篷。在公审大会上，群众义愤填膺，很多人登台控诉，声泪俱下，当人民政府的代表宣布接受群众要求，处姚、李二逆以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当天，枪决“二九”的消息，不胫而走，全市人民如逢喜庆，到处锣鼓喧天，街头巷尾，人们无不称赞人民政府的德政。道外有一位没能参加公审大会的老先生，竟出两块钱的高价，向一个小孩买了一张大会印发的陈述姚李罪行的传单，留作纪念。多年冤仇，一旦昭雪，这委实是市人民在解放初期的一大快事。

原载《哈尔滨晚报》1962年7月20日第三版

义和团对哈尔滨的围攻

沈 語 凡

7月25日（俄历7月13日），是义和团围攻哈尔滨的日子。这是光绪26年，即1900年间的事情，距离今天已经有六十二年了。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我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而腐败透顶的清政府对人民尽管象凶神恶煞一般，但对帝国主义却卑躬屈膝，致使我国内忧外患连年，大好河山，几被列强瓜分。因而在1900年，我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河北）等省义和团运动的鼓舞下，东北各地也纷纷组织了义和团和忠义军，举起了反帝的旗帜。这些爱国志士们，到处灭洋人、杀赃官、烧教堂、拆铁路，反帝的狂风起云涌，使得一切外国侵略者，特别是正在东北铺陈铁路的帝俄官员们大惊失色。是年7月22日（俄历7月10日），东清铁路总工程师尤果维奇下令停止铁路工程，要求各线俄国员司分别撤退到后贝加尔、沿海州和旅顺、大连、哈尔滨等地。尤果维奇本人则准备率领全部铁路员司和“护路”军死守哈尔滨，从哈尔滨向海参崴和俄京彼得堡声请援军的急电象雪片一样。在这不久之后，就发生了义和团围攻哈尔滨的事件。

7月25日清晨四时，松花江对岸沙坨子的义和团和中国军队，以大炮四门开始了对哈尔滨的轰击；同时，一部分来自阿什河的义和团占领了香坊田家烧锅，并以此为据点，对市内发动了攻势；还有一部分渡过松花江，迂回到顾乡砖场以南的烧锅附近，向市内猛攻。帝俄方面在哈尔滨的兵力，约三千五百人左右，即八个步兵中队、十个骑兵中队（每中队百人），还有一些由非战斗人员诸如文书、鼓乐手和铁路职工杂凑起来的预备队和志愿军，其武器则只有短枪（其中很多还是旧式的单发枪），铁路工厂临时赶制出来两门青铜大炮，根本没有使用价值。这样的一群武装人员，在义和团和中国军队

的围攻之下，在猛烈的炮火当中，其张惶失措的狼狈情况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义和团的进攻，偏巧遇上暴雨，加之各方面的配合很差，所以未能攻进市内，并在当天夜间相继撤退。8月2日，沙皇派遣的俄国侵略军由萨哈罗夫率领，从松花江乘轮船来到了哈尔滨，其后，萨哈罗夫、尤果维奇与吉林将军长顺、盛京将军增祺等反动官员勾结起来，对义和团展开了血腥的镇压，这样，哈尔滨才最后得以解围。

义和团虽然没有攻克哈尔滨，但是，它对哈尔滨的围攻，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若干年后，在哈的帝俄遗老和俄国上层人物提起此事，犹然谈虎色变，而7月25日——义和团围攻哈尔滨的这一天，也就成了他们纪念守城“胜利”和悼念死者的日子。

原载《哈尔滨晚报》1962年7月25日第三版

外来語杂拾（之一）

江 南

瞿秋白同志1920年冬天经过哈尔滨赴苏联考察时，在他的旅途游记《饿乡纪程》中说，哈尔滨的人“上上下下都能讲几句‘洋经济’的俄国话”。那时候，精通俄语的人固然不少，而只是会应付几句蹩脚俄语的就更多。人们在日常口语中，常常掺杂有外来语的成分。其中有一些，虽然应用范围越来越小，但现在仍然在口头沿习流传。研究外来语的同志，把这种语言现象的发展变化研究一番，倒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呢。

譬如，穿着方面，在我们这里说连衫裙，就不如说“布拉吉”（Платье）直截了当。说“波金克”（Ботинки），人们知道这是指半高腰的皮鞋。下雨天穿的套鞋（里面可以穿皮鞋的），过去习惯于叫“克罗斯”。这就是俄语 Калоша 的译音。

饮食方面，俄国人常用的饮食，许多我们也都有借用词。面包（Хлеб）叫作“黑列巴”。而一种梭形的白面包，俄语是 Сайка，我们就叫作“赛伊克”。Водка，有人叫作俄国烧酒，但是更多的人喜欢叫它“沃特卡”。行不改名，坐不更姓，似乎这样更能表露它的火辣浓烈的本性。用麦芽、面包屑或浆果酿制的清凉饮料 Квас，我们也就干脆叫作“葛瓦斯”；酸奶酪 Сметана，也就叫作“西米旦”了。过去这里的俄国人还喜欢喝一种叫作 Буза 的饮料，它是用小米、荞麦酿制的。中国居民有时也愿意尝试尝试，就把它叫作“布乍”。杂拌糖俄语是 Монпансье，老家是法国，糖果店的售货牌子上就标成“毛八舍”。上面这些词都是音释。还有些词，前面按音译，后面又加上个汉语表意成分，如象啤酒 Пиво（麦酒）、马林果 Маллина（复盆子）。而“苏波汤”，俄语 суп 本来就是汤，我们又给它添了汤，这一来就成了双料的“汤汤”了。在做“苏波汤”时，总要放几片月桂叶子，作为香料。从此这种叶子就有了“苏波叶子”，实际上也就是“汤叶子”的名称。其实这种叶子不单是做汤用。过去俄国人渍酸黄瓜和西红柿，也爱放些在里面，做了出来，是特别鲜美的。

在日常用具方面，我们也可以找到许多例子。譬如把灯泡 Лампа 叫做“拦包”，把水桶 Ведро 叫做“维得罗”，把自来水龙头 Кран 叫做“格兰”，把烟斗 Мундштук 叫

做“木式斗克”等。俄语机器Машина，是从法语machine来的，我们从俄语转借过来而音译为“马神”，这就成了外来语中的外来语了。机器的应用是很广的。于是，小汽车从前就被人们叫做“马神车”；带有唧筒的水井，叫作“马神井”；縫紉机，叫做“马神机”，或者干脆叫作“马神”。既是译音，又无标准译法，也就难免使人望文生义，发生误会。以前有一位外地的朋友，曾经好奇地问：为什么哈尔滨用麻绳縫衣服？孰不知此“麻绳”并非彼麻绳，“麻绳”者，“马神”也。这一来这位朋友更加糊涂了：“马神？牛神？”费了好一番唇舌，他才明白这是縫紉机的外来语，不由大笑了一阵。

原载《哈尔滨晚报》1962年7月27日第三版

外 来 語 杂 拾（之二）

江 南

在职业和身份称谓方面的外来语，也有许多是哈尔滨人悉知的。譬如，把军官Капитан叫作“戈比旦”，把外国妇女叫作“马达姆”。兵士的俄语是Солдат，以“特”音结尾，而我们又按照老头子、小孩子的后缀方法，把尾音一转，就叫成“骚达子”了。俄语Мастер是工长、匠师的意思，有人读作“麻斜儿”。工厂里的“大麻斜儿”、“二麻斜儿”，也就是大小工头。这种叫法在过去的工厂里是很通行的。俄语Работа是作工的意思，有人念成“劳包抬”。过去穷人干苦力活谋生，“卖劳包抬”也就成了口头禅了。

在旧社会，人们习惯于把坐牢叫作“蹲笆篱子”。这并不是唐朝诗人刘锡禹所说的“溪中士女出笆篱”的笆篱，那是指用竹或草编成的障蔽物；在意念上，它也不是杜甫诗“局促伤樊笼”中樊笼的演变。我请教了几位“老哈尔滨”，才知道这笆篱子也是外来语。在帝俄时代，警察和警察局都叫Полиция，中国人读作“巴里斯”。原来的警察街，也有叫“巴里斯街”的。被抓进警察局，就意味着要坐牢，人们就说成蹲进“巴里斯”，再转个弯，就成了蹲“笆篱子”了。至于俄语监狱是另一个词：Тюрьма。监狱附近的原中国头道街，过去也有根据俄语语音叫作“秋里木街”的。但把坐监牢说成蹲“秋里木”，却没听说过。

笆篱子这样的词，有点叫人迷离扑朔；还有一些词语，借用得也很巧妙。如象Базар俄语是集市、闹市的意思。我们取其译音“八杂儿”，又添上个市补足辞意，构成新词。一提起“八杂市”，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那里有着五花八门的杂货用品，是个五行八作嘈杂热闹的市场。念起来，它又保有俄语原音。还有暖炉Лечь，汉译是“壁里砌”。壁里砌——暖炉，这又很有谜语的味道。

也有的外来语，经过我们一番抉剔，意旨更加浓缩，个性更加鲜明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在俄语中，火车有客车、货车之分。但不管客车货车，都统称为Вагон。这原是英语Wagon的借用。我们就依据俄语，音译为“瓦罐”。罐罐罐罐，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用来指漂亮的客车，是不很贴谱的。于是“瓦罐车”就转而成为能够密封的货车独享的绰号了。

原载《哈尔滨晚报》1962年7月31日第三版

外 来 语 杂 拾 (之三)

江 南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许多外来语也不断发生兴衰隆替的变化。有的词语顺风行驶时,有的词语又成了明日黄花。有的在过去是家喻户晓的,今天却陌生费解了。譬如在度量衡方面,论长度,过去常以“沙绳”为标志。“老哈尔滨”都很熟悉,一“沙绳”等于中国尺6尺6寸。论重量,则以“普特”、“封特”为单位。“普特”过去有人写成“布兜”。买一“布兜”元豆,你以为只是小小一荷包,那别人可要怪你“不知轻重”了。原来,一“普特”折合16.38公斤,中国秤三十二斤有余。可曾见过谁身上有这样大的“布兜”,可以装那么多沉重的黄豆呢?还有,在帝俄时,西伯利亚一带习惯于以Ky6为容积单位。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哈尔滨居民在买木料时,也就依“古棒”的多少而论价。只要说要一“古棒”木料,人们就会知道,要的是一立方米。

还有些名称,当初是有来由的,时代迭经变迁,它们虽然没有淘汰,但原意后人已经习焉不察了。譬如现在的抚顺街和抚顺小市,过去一直叫作地包街、地包小市。你以为那里的地皮不甘寂寞,楞鼓起一块大包么?不是的。原来地包是俄语Депо的译音,意思是车辆汇集、检修的地方。简单说,就是机务段。不过用机务段这样的字样,伪满以后才通行。而地包这个名字,却是和三十六棚同年同庚。有了中东铁路,Депо也就应运而生了。又如霞曼街这个斯文的名字,也是从俄语来的。俄语Саман,指杂有麦秆谷草之类的粘土坯。当初这里的房子是非常简陋的。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懂得沙曼屯的来历。俄国人把它叫作Саманный Городок,也就是土坯房的小镇集。到今天,无论是霞曼街还是沙曼屯,读音仍然是俄语土坯房,但是面目全非旧观了。

外来语在过去的某些风俗习惯上,也留下过痕迹。譬如,每年于3月21日起,在满月后第一个星期,是基督复活节,中国人称之为“巴斯赫节”或“巴斯节”。这是一个盛大隆重的宗教节日。帝俄时,铁路工厂等单位的中国职工照例也和俄国职工一样休假数日。按俄国风俗,人们见面时要互相亲吻,以“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 (基督复活了)!”相祷祝。在节日蛋糕上,有着这句话的缩写X.B的字样。此外,俄国人家家家户户还要做一种叫作“巴斯赫”(Пасха)的点心。这种与节日同名的点心是一种甜奶渣糕,亲友临门,都要端来分享共尝。这正象我们把端午节叫作粽子节,家家吃粽子一样。同时犹太教中的“逾越节”,也叫“巴斯赫”而哈尔滨在过去犹太人又很多,因此“巴斯赫”这个名字更加不脛而走了。

上面提到的一些外来语,只是就俄语这个渠道而言。其中有些已经在我们汉语词汇中生根落户了,如象啤酒、布拉克。而另外一些,有的已经陈腐了;有的又有了更恰当的新词代替。根据汉语规范化的原则,对那些有碍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的,我们不宜再因袭搬用,而是应该把它们淘汰才是。

原载《哈尔滨晚报》1962年8月2日第三版

兆麟公园話今昔

左学仁

不论是明媚抚人的春天，还是百花盛开的夏日；也不论是雨灑芳菊的秋天，还是白银铺地的严冬，兆麟公园总是以它那娇娆的姿容，五彩绚烂的风光，诱讨着游人的喜爱。是的，兆麟公园如今已成了我市劳动人民休息和娱乐的乐园。

兆麟公园的历史至今也不过五十多年。1906年，这里是红十字会医院用地（即现在的儿童医院），由俄国人建起“董事会花园”，面积仅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左右，园内设备简陋，1910—1927年间才建成了音乐堂、茶店、休息室、活动照象馆、一座戏院、两个小电影院，仅有几十种草木本花的花卉温室两栋和一座浇花用的水塔、喷水池等；动物只有鹿、狼、黑熊和猴子，此外还栽植了一些杨、榆树。花园面积很小，园内景物一目了然。这就是兆麟公园的前身了。当时这里只供俄国上层人物与中国封建军阀、富商仕贾消遣取乐，劳动人民是不能入内的。道里区被旧中国政府接管以后，“董事会花园”改为“特别市公园”，将园外之“验车处”划入公园，改为“哈尔滨特别市公园阅报社”（即现在的公园餐厅），在现在的兆麟将军墓后面盖起一座“公园茶社”，里面有说评词、唱大鼓的（此茶社由于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于1951年拆除）。还准备挖小河、堆假山，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未能动工。

1931年日伪统治时期，“特别市公园”改为“道里公园”，拆除了破损的建筑物，修起了小河、假山和凉亭。1935—1940年期间又建设了儿童运动场，设备仅有秋千、单槓和用人推的转马。后来相继建筑了音乐堂（即现在的露天剧场）和七个小动物舍，开辟了几处绿地、花坛。新建了四栋花卉温室。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鬼子为了修防空洞，便将公园很多树木砍掉，把公园四周的铁栏杆全部拆除，把个公园弄得百孔千疮。当时，日伪特务常常在这里出没；我们的抗日英雄们也常在这里进行秘密活动。据何成湘同志写的《和杨靖宇同志的三次会见》一文中记述：1931年杨靖宇同志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时，为了进行秘密活动，摆脱特务的破坏，何成湘同志和杨靖宇同志是采取单线联系。那时，他俩常常在街头或公园里碰头，而去得较多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兆麟公园（见《烈士永生》一书）。

解放后，这个公园最初仍叫“道里公园”，后因李兆麟将军被害，公葬于园内，为纪念这位抗日民族英雄，才于1946年8月15日以兆麟将军的名字命名。此后，兆麟公园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有步骤、有规划地进行了整修和扩建，增加了设施，美化了园容，才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原载《哈尔滨晚报》1962年8月4日第三版

噩耗陡至 灵牌独设 官場喪考妣
喜訊紛傳 旗帜双挂 民間送瘟神

江 南

1916年（民国五年）6月6日下午，北洋军阀政府发出公报：“袁大总统于本日上午十时四十分以尿毒病薨逝。”

袁世凯这个做过八十三天皇帝的窃国大盗死了！消息传来，如井投石，当时处于“东陲塞北”的哈尔滨，也很快激起层层涟漪。

就在这“洪宪元年”的新春正月，袁世凯正做帝制迷梦的时候，有人还在哈尔滨的报纸上大谈阴阳图讖之说，说什么“今年岁次丙辰。丙者火也，辰者龙也。今年当有赤帝子出现”，说什么“袁皇帝以火德王尚赤，今年真龙天子出现，应在袁皇帝无疑”。曾何几时，这条手爪沾满噬人赤血的孽龙，引火自焚，在牧野倒戈、众叛亲离和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匆匆钻进了棺材！

当时，这里的滨江县和上面的滨江道，都受吉林省管辖。吉林督军孟恩远在袁世凯称帝大封五等爵位时，也曾膺得一等伯。主子施恩，奴辈效命，云南蔡锷誓师反袁，这位“镇安左将军”还张罗过派遣伐滇敢死队，勒令全省严防南方党人，派员检查邮递信件等等。现下主子死了，自不免又有一番手脚忙乱了。

袁世凯死的消息，是6月7日下午传到哈尔滨的。滨江道尹李鸿谟奉吉林官府谕文，立即发表了讣告，订出了“致祭礼仪”，规定由6月12日起设立神位木主，临空遙祭七日。与祭人得穿大礼服，左袖纏裹黑纱。公文封面纸面改用五分宽的黑边，印铃都用黑色。官署停止饮宴，并且传谕百姓辍乐七日。民间婚丧嫁娶，这时也只好先给袁世凯的幽灵停车让路了。

6月12日，道尹李鸿谟率同“官商绅民”，在当时的吉林铁路交涉局衙内祭灵。一篇四言祭文，曲尽谄谀能事，说什么“惟我总统，天生圣神，丰功伟绩，中国一人”“惟我总统，力保治安，利民福国，五族腾欢”……。这次祭灵就在“呜呼痛哉”的爆耳的干嚎中结束。

可是，是非自有公论，且看老百姓的反响吧。当时商民店户，奉谕悬挂致哀半旗，而挂出来的，不但不是半旗，偏偏还是双旗交叉。按民国的礼仪，只有吉日良辰、荣典志庆才这样悬挂的。滨江县知事看到，急得如坐针毡，急急忙忙通知警察，勒令家家户户把旗扯下来。好吧，挂也是你，撤也是你，撤就撤吧。但是按照北京“国务院”的规定，旗是必须挂的。过了两天，这位知事老爷又只好再次传谕把旗挂出来。结果呢，仍然有人“甘冒大不韪”，坚持双旗交加，非把“海内共哀”改换成“普天同庆”的局面不可。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挂旗法，正如当时有人在报上谈到的：“映于眼帘，殊觉光怪陆离”“参差不一，殊属花样翻新！”

挂旗一事虽小，确很耐人寻味。当时中东铁路公司主办的《远东报》，在短评中就曾指出：这“不啻将商民之心传出”。在另一篇短评中又说：商民“不但无哀悼之意，